

再現危機及其之後

——探詢當代質性研究的認識論基礎

張威克*

摘 要

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在北美發展的歷史進程中，經過了多個變化階段。其中重要的轉捩點，出現在「再現的危機」階段，進而引發三大危機同時迸發；此後，才過渡到後現代式的多元文本。巨型理論被更為本土、適合特定問題與情境的小型理論所取代；研究者也積極對「知識」進行全面性的檢討與反省。在此一歷史脈絡中，從再現危機所引發三大危機的連鎖反應，進而出現多元文類的轉折裡，筆者並未明確找到認識論的基礎。故本文目的：在嘗試從認識論的視角，說明再現危機發生的原因，以及危機之後，質性研究得以邁入後現代民族誌寫作實驗期，並接受多元文本作為質性研究文類的轉折。研究方法則採取 Ricoeur 詮釋學方法：距離化與據納雙重進路。最後，本文結論認為：當所有研究成果終須透過「再現」公諸於世時，將會面臨三大危機同時出現的困境，各類研究文本的合法性與實踐性亦將受到質疑；於是，必須透過符號系統再現的各類研究文本，將不再有優劣之分，原本以實證論為研究典範的立場被揚棄，質性研究不再擔心受到實證論的挑戰，並以「喚起」置換「再現」，更有自信地發展各種研究文類，並將研究帶入後續眾聲喧嘩的階段。

關鍵詞：質性研究、三大危機、歷史、認識論

*張威克，國立東華大學體育與運動科學系教授。Email: arthurchang@gms.ndhu.edu.tw。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and Beyond: Exploring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temporary Qualitative Research

Arthur Chang *

Abstract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North America, there have been several stages of transformation.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occurred during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which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triple crisis simultaneously, eventually transitioning into a postmodern-style of diverse texts. Grand theories were replaced by smaller, context-specific theories, and researchers actively reexamined and reflected on "knowledge." In this historical context, from the chain reaction of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leading to the triple crises and the subsequent emergence of diverse genres, the author did not explicitly find the epistemological foundatio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ttempt to expl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pistemology, the reasons for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 and how qualitative research entered the postmodern period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ic writing phase and embraced diverse texts as a turning point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genres.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Ricoeur's hermeneutics approach: distanciation and appropriation of interpretation. Finally,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when all research results must be presented through "representation," they will face the dilemma of the triple crisis occurring

*Arthur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imultaneously, questioning the legitimacy and practicality of various research texts. Consequently, all types of research texts represented through symbol systems will no longer be judged superior or inferior. The previously dominant position of positivism as a research paradigm is abandoned, and qualitative research is no longer concerned about being challenged by positivism. Instead, it replaces "representation" with "evocation" and develops various research genres with confidence, moving the research into a subsequent phase of cacophonous voices.

Key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triple crisis, history, epistemology

一、楔子

一般而言在體育學術領域中，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多採取實證主義量化研究 (quantitative research)；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術論文，則有部分會採用質性研究 (qualitative research) 的方法來進行，其中主要又以人文領域學門，包括運動哲學、體育史學，以及部份社會科學學門，如運動社會學、運動管理學等研究為大宗。雖然體育界早期的學術研究是以量化為主，質性研究在研究產量的比例上，相對而言低了許多；千禧年之後，質性研究的數量開始有明顯上升趨勢，這種現象不僅出現在體育界，甚至擴張到整個臺灣的學術氛圍中，其中不僅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出現大幅度增加的質性研究成果，¹甚至在屬於自然科學領域的運動心理學，也開始涉足質性研究，並逐漸增多以質性研究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以質性作為研究方法的論文，顯然無可迴避地必須面對其方法背後所涉及的認識論 (epistemology) 議題，但從質性研究的變遷史來看，其中雖然出現多個階段的變化 (請參閱從下一段開始的說明)，但真正帶動整個認識論翻轉的關鍵階段，筆者以為是由「再現危機期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²所帶動。此後的質性研究開始脫離量化研究的認識論典範，而大膽嘗試各

¹此種論點是依據筆者於1994年參加臺灣師大體育研究所，為碩博士研究生所舉辦的seminar時 (在師大分部舉行，筆者亦為研究生之一)，當時的碩士生黃光獻，以過往體研所的學位論文為樣本，所進行的簡單統計，發現質性研究的數量，從1990年代開始，數量就有明顯增加現象。至於2000年之後，筆者發現單以「敘說」為主軸的學位論文數量，不僅在體育學界呈現逐年增多現象，亦在其他學術領域如：護理學、醫學、生死學、人類學等，也有明顯的成長。是故，乃以此表示純係透過個人經驗所做出的判斷。

²再現 (representation) 一詞，在中文世界有許多不同的翻譯，大致包括：表徵、表述、代表、表象、再現、再呈現等多種譯法。本文屬意譯為「再現」，主要在凸顯：事物只要經過「再」一次者，就已經與事物原初的 (original) 本身，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

種新文類的寫作風格。故而，以再現危機期作為認識論轉折的分水嶺，似乎是一種可以接受的探索起點。另外，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佔據體育學術研究相當重要的部分，因此，為體育界在人文與社會科學學術領域中，藉由釐清當代質性研究的認識論基礎，探索質性研究出現重大觀念轉折的元素，正是本研究的重點所在；也期望能藉由本研究的出現，得以協助以質性研究為基礎的體育學術研究者，對自己的研究找到信念的基點。是故，本研究將從質性研究整體歷史的變遷，作為探討的起點。

在探索質性研究變遷史的過程中，許多研究者多會找到 Denzin 與 Lincoln 共同編輯有關質性研究的著作，並從中發現，兩位作者對質性研究演進歷程的分期，大致依循傳統期 (traditional period, 1900-1950 年)、現代主義期 (modernist phase, 亦稱黃金時期, 1950-1970 年)、領域模糊期 (blurred genres, 1970-1986 年)、再現危機期 (1986-1990 年)、後現代民族誌寫作實驗期 (postmodern period of experimental ethnographic writing, 1990-1995 年)、後實驗探索期 (postexperimental inquiry, 1995-2000 年) 等不同時期的變化 (Denzin & Lincoln, 2000, p. 3, p. 12-17, 2005, p. 3, p.14-20)。雖然作者在不同時期出版的資料中，稍有分期上的差異，但差異僅是 2000 年以後的分期，³之前的分期並沒有更動；他們也進一步指出：將認識論理論化的浪潮，橫貫了這些時期 (Denzin & Lincoln, 2000, p. 3, 2005, p. 3)。但經查證，卻無法在書中找到「將認識論理論化」的明確論述。⁴

³在 2000 年的版本中，將 2000 年以後設定為第七期，即未來期 (the future, 2000-)；但在 2005 年的版本中，將第七期定為方法論競爭期 (methodologically contested present, 2000-2004 年)，並增加第八期，即斷裂的未來期 (fractured future, 2005-) (Denzin & Lincoln, 2000, p. 3, 2005, p. 3)。

⁴筆者所謂「沒有明確的論述」，是指筆者並未在書中找到有系統地針對質性研究的認識論理論化論述，但 Denzin 與 Lincoln 應該是將相關論述拆散在許多章節中，例如，書中的第二單元：轉換中的典範與視角 (Part II: paradigms and perspectives in transition) 中，就以七 chapters (從第六章到第十二章，頁數從 156 頁到 365 頁) 的內容進行詳細說明，但由於各章作者並不相同，研究典範轉換時所涉及認識論的說明，

本研究刻意聚焦於再現危機，是因為再現危機是源自於人文學科對描述社會真實 (social reality) 的手段的懷疑；在美國，此一危機顯示了在二戰之後的典範失敗，表示將許多領域的觀念統一在單一典範下，用以說明整體西方社會狀況的做法，不再受人歡迎 (Marcus & Fisher, 1986, p. 8-9)。質性研究再現危機的出現，⁵以及隨之引爆的三大危機 (triple crisis)，⁶進而帶動質性研究進入一個新的研究視野，乃是因為此一典範下的認識論發生了轉折，這對質性研究的後續發展相當重要。經此轉折之後，質性研究與實證主義 (positivism) 量化研究的典範漸行漸遠。以往在量化研究環伺下，質性研究輕聲細語、瞻前顧後，唯恐惹人嫌棄的姿態已然不見，反而挾著充沛的能量，眾聲喧嘩的氣勢，營造流行風潮，強力影響著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研究 (劉一民，2005，頁 83)。若能進一步理解此種研究的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所涉及認識論上的變化，將更能協助從事質性研究的工作者，從「知其然」進階到「知其所以然」。是故，再現危機期前後所涉及的認識論轉變，就成為有深究必要的關鍵元素。

首先，筆者試著從 Denzin 與 Lincoln (2000) 在《質性研究手冊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中的說明，找尋認識論變化的蛛絲馬

也就難以統整。雖然第七章以「質性研究的三種認識論立場：闡釋論、詮釋學與社會建構論 (Three epistemological stances for qualitative inquiry: interpretivism, hermeneutics,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為題進行說明，但筆者認為仍然沒有將「再現危機」期前後，所涉及的認識論基礎，做出明顯的交代，因此，這也是本研究認為有進一步釐清必要的原因。

⁵再現危機期的出現，有研究指出乃是因為1984年在美國新墨西哥州聖塔菲 (Santa Fe) 的美洲研究院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所召開為期一周的小型專題研討會，主題為「民族誌文本的打造」(The making of ethnographic texts)，並在1986年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集結出版《書寫文化：民族誌的詩學與政治學》(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Clifford & Marcus, 1986, p. xxi)。書籍問世之後，立即在人類學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反響，其餘波也衝擊到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並證明這是民族誌進入一個多元發展時代的主要推手，這似乎也呼應了Denzin與Lincoln (2000, p. 3, 2005, p. 3) 將1986年訂為再現危機期出現年的原因。

⁶所謂「三大危機」是指質性研究在「再現危機期」所發生的連鎖反應。也就是由最先出現再現危機開始，進而引爆合法性危機 (crisis of legitimation) 與實踐危機 (crisis of praxis)。本文也會利用第三單元「再現危機的出現與後續」中，進行說明。

跡。作者指出在領域模糊期階段，Geertz (1973, 1983) 兩本書《文化的解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與《本土知識》(*Local Knowledge*)的出現，為這個時期提供了重要養分，尤其 Geertz 所提倡的「厚實敘寫 (thick description)」，在強調人類學的寫作其實是對解釋的說明，而作者在解釋性文本中現身的問題，反而成為當時的課題。此時期，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的界線變得模糊，「出現一種特殊的凌亂散漫形式，包括：像虛構小說的文獻 (如 Mailer)、如同民族誌的般的預言 (如 Castaneda)、看似旅行見聞般的理論論述 (如 Levi-Strauss)。……像藝術品般的散文 (essay)，取代了科學論文 (scientific article) (Denzin & Lincoln, 2000, p. 15)。」顯然，領域模糊期的特徵，讓文學性的書寫特質跨進質性研究領域，但這僅止於對方法上的變化做出說明，卻沒有點出認識論上的變化。

從領域模糊期追蹤到再現危機期，Denzin 與 Lincoln 的說明似乎也有類似現象。⁷書中舉出人類學家在 Songhay 部落進行田野工作時，所感受到的再現危機為例，發現自己在蒐集資料時，學到的一門功課是「受訪者如例行公事一般，對人類學家說謊」(Denzin & Lincoln, 2000, p. 16)。顯然研究過程所獲得的資料，都是無價值的，這使得寫出來的研究成果也不再有意義，因此有關書寫 (writing) 與田野工作 (fieldwork) 之間的差異性，遂成為分析的重點。於是，書中提出再現危機期對研究關照方向的轉化：將寫作視為一種透過連續自我反思階段的研究方法，「……這些對主體新的寫作技術，成為製造知識 / 權力與資本 / 地位軸線的支點。……作為一系列再現的寫作，田野工作者透過實地的經歷與工作，最終以公開呈現的民族誌和敘說經驗成為研究文本。此時，田野工作和寫作兩者之間就模糊不清了；甚至分析到最後，兩者之間並無不同 (Denzin & Lincoln, 2000, p. 17)。」此處雖然明確指出書寫與田野經驗之間的曖昧不清，但在對認識論上的解說，似仍嫌不足。

⁷本段所呈現的資料，主要是摘自 Denzin 與 Lincoln (2000, p. 16-17) 的陳述。

另外，Lincoln 與 Denzin (2003, p. 7, p. 11) 在《質性研究的轉捩點：在手帕上打結 (*Turning Poin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ying Knots in a Handkerchief*)》一書中提到：呈現 (presentation) 與再現之間，是緊密連在一起的，但實在論者 (realist) 與闡釋論者 (interpretivist) 間之再現方式的裂痕，卻一直無法癒合；人類活生生的經驗 (oral experience)，⁸直接導出了一種實驗，即：從文學和故事形式以及表演中，所藉用的文本表現形式。這兩位學者甚至提醒我們，學術界還有一些未被解決的問題，即截至目前為止，並沒有一種「常規科學 (normal science)」，是被每一學術社群的全體成員所完全同意的 (Lincoln & Denzin, 2003, p. 12)。簡言之，書中雖然點出：人類鮮活的生命經驗，和將鮮活經驗語言文字化之間，仍然存在裂隙，但作者卻沒有具體將此種裂隙的認識論原委交代清楚。也就是說，從 Lincoln 與 Denzin 的敘述中，無論在領域模糊期或是在再現危機期，有關質性研究究竟發生何種認識論上的轉折，以致後來能充滿自信的發展出眾生喧嘩、百家爭鳴的場景，筆者心中的謎團依然沒有獲得解決。

雖然在大師等級的書中，並未找到解決心中疑惑的答案，筆者試著從其他方向尋找解答，也就是試著從其他有關質性研究的書籍或研究成果中尋找答案。

有關質性研究的出版品並不在少數。其中，《反思性方法：質性研究的新前景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一書提到：反思性研究的要素中，對於解釋 (interpretation) 應該要有基本的澄清，因為這涉及對研究對象的解釋與再現課題的反思、涉及對政治意識形態自覺的反思，也同樣涉及對再現與威權議題的反思 (Alvesson & Skoldberg, 2000, p. 7-8)。書中利用第五單元〈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

⁸此處所謂的活生生經驗，原應使用「live experience」，但每一個體的經驗，如果沒有經過口述的 (oral) 過程，都將僅留存在個體私人的認知領域，而無法被分享或被他人理解；唯有將經驗口語化，才可能被認知，也才有可能被研究或被詮釋。故作者在此將此活生生經驗口語化的現象，標示為「oral experience」。

破壞主體與文本的穩定性 (Poststructuralism and postmodernism: destabilizing subject and text)》，嘗試分析後結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中，跟哲學與方法論相關的論題，並以 Derrida 的解構及 Lyotard 的知識觀、主體思想，解釋敘說和修辭的科學與文本的產製，雖然其中提及語言、意義、主體、想像等議題，讓「再現」的問題走向舞臺的中心 (Alvesson & Skoldberg, 2000, p. 149-151)，但有關再現危機的認識論轉折，說明的並不清晰。

再列舉幾份質性研究相關著作，包括：胡幼慧 (1996) 主編的《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文軍、蔣逸民 (2010) 主編的《質性研究概論》、瞿海源等 (2013) 主編的《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一) 總論與量化研究法》，與潘慧玲 (2003) 的〈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或參照 Denzin 與 Lincoln 的歷史分期，或參考 Alastalo 的歷史分期，⁹僅以極短篇幅對質性研究史進行介紹，遑論進一步說明再現危機期前後的認識論轉折。更有甚者，乾脆對質性研究的發展歷史略而不談，如：Crabtree 與 Miller (1999) 的《做質性研究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及齊力、林本炫 (2005) 的《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均屬之。稍微從事細膩說明的研究，當屬劉一民 (2005) 的〈質性研究的異想世界：一個知識想像史的探勘〉，對質性研究各時期的變化，做了較詳實的說明，當中自然包括從領域模糊期到再現危機期的轉折變化，但論述重心是以重要文獻的出現，如 Geertz 的《文化的解釋：選文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與《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兩本書，及 Malinowski 日記的出版，

⁹依據瞿海源等 (2013, p. 3-5) 的資料顯示：Alastalo 在《社會研究方法指南論集 (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中，特地寫了一章有關社會研究方法的歷史，將社會研究方法的發展史分為五個階段，先簡單介紹五階段各自著重的方法與發展，並進一步與 Denzin 與 Lincoln 的各個分期以表格方式進行對照。

¹⁰或例舉人類學者心中暗藏的意識形態為主，如 Malinowski 在日記中，對原始部落居民的鄙視、厭惡；或兩位人類學家對同一個異文化民族的研究，卻能寫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至於深層的認識論分析，仍然無法讓人一目了然。

前述所言，主要在說明質性研究演進歷程中，在再現危機期之後，明顯發生研究典範的轉移，但其背後的認識論變化，卻沒有被清晰的論證；但此一認識論轉折，卻是對從事質性研究者能知其所以然的重要基礎，也因此成為本研究的目的，即透過哲學認識論的分析，讓目前從事質性研究的學者，對再現危機所帶來的認識論困境，以及危機之後質性研究認識論的轉向，做出清楚交代，以使其更有信心接受自然科學實證論的挑戰。研究方法則是採取詮釋學大師 Paul Ricoeur (1913-2005) 的兩個對翻概念：距離化 (distanciation) 和據納 (appropriation) 來說明。所謂距離化，是指「將說放進所說之中」，重點在於強調書寫文件的特性和好處，因為書寫 (writing) 能使文本獨立於作者之外，獨立於談話情境之外，並讓文本對所閱讀文本的讀者開放；所謂據納，意謂是書寫的對翻面，也就是閱讀；人透過文本的閱讀理解自己、理解世界。因此距離化與據納的對翻，就等於創作與理解的對翻 (蔡錦昌，1990，頁 183-185)。兩者之間恰好構成某種辯證循環的關係，彼此互相溝通、影響，促使詮釋者對談話、作品，或行動等的意義得到更深更廣的了解 (劉一民，2005，頁 144-145)。

換言之，這種詮釋方法，一方面使詮釋者在詮釋作品或行動的時候，需要創造性的保持距離，以便詮釋者能對詮釋對象進行完整而全面性的關

¹⁰在日記中，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 透露自己在進行田野工作時，經常鄙視、厭惡原始部落的居民，甚至還怒毆打過報導人，日記裡也直呼原始住民為「黑鬼 (nigger)」。「他用很多粗魯的事情，來描繪他終日所生活的原始部落，而且用很多粗野鄙視的文字去刻畫他們。他花費了很多時間抱怨，並由衷希望自己生活在其他地方 (Geertz, 1983, p. 56)。」這與他一再強調田野工作者要保持中立、客觀、深入被觀察部落的日常生活，以便掌握當地人觀點的立場南轅北轍。有興趣進一步瞭解者，可參閱其出版的日記：*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Routledge, 2004.

照，進而使詮釋者不再用含混的態度對待詮釋對象，以發掘更豐富的意義；另一方面，詮釋者因為據納了造就詮釋對象的背後所涉及的時間、空間、文化、傳承等，會更能融入詮釋對象的生活世界，進而更易感受人類心靈、歷史或文明發展洪流的一體感（劉一民，2005，頁 145）。後者強調融入的態度，以貼近真實的理解；前者關注抽離的功夫，以獲致事物的全貌。詮釋者就遊走在這種「融入」與「抽離」的循環中，既有創作的歷程，亦有理解的分析。

以本文第二節為例，主要是針對實在論（realism）與相對論（relativism）兩種不同認識論為基礎的質性研究典範轉移現象進行論述，以說明所有研究最終都離不開文字符號的再現系統，但卻又發現再現系統卻有本質上的界限，無法再現全貌，於是才會引發危機，並進而帶入第三節的說明。

全文共分四段：壹、楔子，主要在呈現研究目的、研究方法、文獻回顧與研究架構；貳、溯源「再現」：為認識論奠基，要透過四重步驟為「再現」的認識論找到詮釋基礎；參、再現危機的出現與後續，是針對再現的認識論作詮釋，並說明再現之後的轉向；肆、結語，係對本文整體論述做精簡歸納與整理。

二、溯源「再現」：為認識論奠基

過去對質性研究領域影響最大的因素之一，就是對有關自然語言的討論，尤其是在討論語言與其所試圖描繪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其中對於科學描述，「可以精確和客觀的再現世界的真實存在」之假設性命題，提出了挑戰，這種發展在最小程度上表明了語言學的模仿（mimesis）是不可能的，也不存在任何與世界完全匹配的描述（Gergen & Gergen, 2000, p.

1026)。雖然對「再現」的討論，被視為一個熱門的議題，但所謂「再現」到底具有何種意涵？依照 Hall (1997, p. 15) 的研究認為再現連結文化中的語言與意義，並指出「再現是指使用語言向他人說出某些關於世界有意義的事情，或有意義地再次展現世界。」又依據《哥倫比亞現代文學與文化批評詞典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的解釋，認為人們對再現的界定，主要包含三層次的意義：1. 看上去相似；2. 代表某人或某物；3. 再一次呈現 (Childers, 1995, p. 235)。換言之，只要論及再現，就必然涉及語言文字的符號系統，且不再是原來的實在 (reality) 本身。¹¹

至於再現一詞的概念，本文認為至少可以從兩種存有論 (ontology) 的立場切入，加以探討。其一是以實在論為基礎的實證主義 (positivism) 或後實證主義 (post-positivism)，另一是以相對論為基調的建構主義 (constructivism) 與後現代主義 (postmodernism)。¹²本單元嘗試從以下四個方向切入，進行論證；前兩個子題主要是從實在論觀點切入，後兩個子題則從相對論立場做說明。

(一) 作為媒介的符號¹³

傳統的研究被認為是以科學的方法，創造正確、客觀的知識 (Alvesson

¹¹本研究對 reality 此一名詞的使用，將會經常出現在後續行文之中，為追求文詞的流暢與達意，將會以「實在、真實、實體」等名稱交互呈現，特此說明。

¹²實在論主張有一個存在於人類感官之外的實體世界，而此一實體世界，可以被人類感官所捕捉，實證主義即採取此一立場；而後實證主義雖然承認存在一個外在的實體世界，卻認為：因為受制於人類知能的有限性，此一實體世界，未必能被人類完全捕捉。至於相對論則主張本體相對主義，認為未必有一個唯一真實的實體世界存在，對實體世界的捕捉，需要透過個人的心理建構 (constructions)。此一建構涉及社會性與經驗性，因而不同情境下的人們，會有不同的建構，使得此種建構也具備在地性 (local) 與特定性 (specific) 的本質 (潘慧玲，2003，頁 119-121)；此一相對論的稱呼，亦有學者將其稱為闡釋論 (interpretivism)，如：Lincoln 與 Denzin (2003, p. 11)。

¹³本研究所指「符號 (sign)」，係指包括所有意欲傳遞作者思維的一切文字、語言、聲音、影像、符號等媒介，均涵括在內；後文再有相同指稱時，均採此意。

& Sköldbberg, 2000, p. 1)。這些研究成果，終將無可避免地必須透過符號，以書寫的形式完成之；另外「從再現的哲學理論來說，語言如同白板 (tabula) 一般，在這個空間裡，事物是以詞彙的形式作為再現而被定序的 (Sheridan, 1982, p. 49)。」而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學的考古學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中，¹⁴投入極大心力探討了歐洲歷史發展歷程中的知識型 (episteme)，其中包括符號系統、書寫、語言、再現，及人的存有等議題，甚至探討前述議題所存在的有限性，頗值得一探。¹⁵其中在討論古典時代的符號時，Foucault (1973, p. 59-62) 認為有三個變量 (variables)，使得符號在經驗的知識領域取代了相似性：第一，符號的不確定性或是可能性，而應使其在知識的內部尋找自己的位置 (area)；其次，符號與其所指 (signifies) 之間的關係之形式；第三，因為依照 Plato 的說法，符號若不是在自然中生成，就是被人們所建構的，因此這個變量要能獲得自然生成與人為約定這兩個價值。

有了這層認識之後，可以發現符號系統成為思想制定的工具，進而把所有的知識與語言聯繫起來，並設法用一種人工符號體系和具有邏輯本性的操作，來取代所有的語言 (Foucault, 1973, p. 63)。至此，知識是由符號所構成，我們的概念、思考、溝通、世界觀等，沒有一項不需要以符號作為媒介。也就是說，科學方法所獲得正確、客觀的知識，最終仍不免要藉自然生成或人為約定的符號系統，創造出研究文本。因此，以傳統實在論

¹⁴該書原本以法文出版，書名為：《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筆者因不諳法文，僅能以英文版翻譯資料作為引用依據，但因法文版書名主標題為「詞與物」，英文版卻改標題為「事物的秩序」，在此特為此種差異提出說明。

¹⁵本書被認為是 Foucault 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其內容是對西方文化與知識史的變遷，進行深刻而細緻的爬梳與分析，且橫跨文藝復興乃至 20 世紀，無論深度與廣度都讓人驚訝！書中許多論述，都與本研究探討的認識論有密切關聯，於是才有「值得一探」之語，供有興趣的讀者進行進階的閱讀。

為基礎的科學研究成果之書寫，有別於非科學性的書寫，¹⁶必須透過嚴謹的符號系統，將既存的實體世界，以中立客觀的書寫方式，再現於世人面前。

此時語言作為「再現」的符號，依照黃光國 (1995, 頁 43) 的詮釋認為：人們相信用以描述世界之秩序的語言，是絕對可靠的，人類可以用語言分毫不差的描述世界。因而透過這些符號系統的再現歷程，就被假定為一項不具爭議性的活動，而是一種對於所研究之對象的透明性報告，能夠忠實傳遞實體的原貌，而不具有任何色彩，僅是一種反映思想的通透性介質。¹⁷換言之，就意義而言，符號形成的文本是透明的 (Polanyi, 1974, p. 91)。

另外，愈來愈多的人已經認識到，由於觀察無可迴避地會涉及大量的解釋，且研究報告基本上也是一種解釋行為，因此研究和再現，是密不可分、糾纏不清的 (Gergen & Gergen, 2000, p. 1027)。這也映證了 Clifford (1986, p. 2) 所言：書寫直到近期才被描繪或認真討論的事實，反映了一種聲稱對再現的透明性，和經驗直接性的意識形態的堅持。雖然符號是認識的工具和知識的鑰匙，但是它卻是與再現，也就是與整個思想共存的；符號處於再現的內部，且貫穿再現的整個範圍。而所有的再現都是以符號的樣貌連結起來，彼此之間構成一個巨大的網絡；每一個再現，都把透明的自身，設定為所要再現的符號，因此它必須要再現；反過來說，此一再現也必須在其自身中被再現 (Foucault, 1973, p. 64-65)。簡言之，在此可以確定的是，以再現來展現真實的各種書寫文本，都必須以符號為工具，且再現所使用的符號會被認定具有反映思想的透明性。

¹⁶所謂非科學性的書寫，主要是指可以在實體世界與想像之間互相穿梭的書寫方式，而非全然以真實世界之現象為書寫依據者，例如：文學 (包括小說、散文、詩等)。

¹⁷這種觀點在 Foucault (1973, p. 56) 探索符號與事物的歷史演進關係時，就發現西方文化從 16 世紀進入 17 世紀，「語言已經從存在事物本身中退出來，並進入到透明與中立的時期。」Foucault 的觀點也恰好可與黃光國的論述相互呼應。

若深究再現的認識論結構，可以發現，如果想要再現某一現象，就必然先存在被再現的原本實在，¹⁸且此一實在，須被個體「有意識地把握住」，才有辦法將自身對該實在所把握的經驗，透過符號來完成再現。例如：我們在描述（即再現）今天上午的一場令人難忘的激烈球賽時，我們必然要先在早上有參與過「這場球賽」（即實在）的經驗（無論是當場上比賽的球員或是臨場觀看的觀眾），且在「參與」的過程中，我們會用我們的各種感官（包括所看、所聽、所觸及、所嗅聞，甚至可能還有的味覺），去體會參與歷程中的各種生理與心理上的興奮與壓力、領先或落後時情緒的高低起伏，觀眾、教練、球員、裁判彼此之間的各種溝通、暗示、叫囂與肢體接觸，感受球隊攻防當下的和諧美感或彼此競爭的糾纏，享受賽前、賽時與賽後，團隊汗水、淚水與口水交織的過程，以及球場內外的整體氛圍（前述這些對參與的感知，即是「有意識地把握住」）；而且我們對所描述的經驗，常以「我口（筆）說（寫）我心」的態度呈現之（即符號具有透明性）。換言之，從實在論的角度來看，存在一個外在的真實世界能被我們所感知，而我們將所感知到的真實世界，經由我們認為具透明性的符號，作為一種再現知識的文本形式展現於世。於是，再現就無法跳脫以具有透明性的符號為媒介的宿命，因為我們無法片刻離開符號，一旦失去符號的介質，我們的思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託。

（二）符號與實在

由於再現無法避開與符號的糾纏，因此，我們可以試著用語言哲學大師 Ludwig Wittgenstein (1889-1951) 後期思想的語言遊戲說 (game theory)，來說明符號與實體世界的關係。¹⁹因為 Wittgenstein 後期所發生

¹⁸此處所謂的「原本實在」，係指存在於外在世界的真實存有本身；並請參閱註腳 11 的說明。

¹⁹本單元有關 Wittgenstein 的論述，主要參考陳錦鴻 (1990, 頁 56-73) 的〈語言哲學大師：維根斯坦〉乙文。

的思想轉變，與前期的語言圖像說 (picture theory) 關係密切，使本文亦不得不簡略介紹其前期思想。在圖像說時期，他將語言的功能定位在描述世界，因此強調「可說的要說清楚，不可說的就要保持沉默 (Wittgenstein, 1996, p. 27)。」而「可說的」是自然科學的命題，此命題在描述世界的真實狀況，所以才有真假可資判斷；而有關邏輯、哲學及宗教等，已經超越了語言的界線，嘗試在說一些「不可說」的東西。換言之，此期的 Wittgenstein 正嘗試讓符號能夠與實體世界形成精確的對應關係。

當 Wittgenstein 進入遊戲說時期，他發現並非各種有意義的符號，都是描述事實的圖像，許多日常使用的語言，多是含混且不精確，但對達成使用語言的目的卻非常有用。他因而放棄了「語詞應與世界精確對應」的立場，認為語詞應該由它的功能決定它的特性，語詞的意義在於它在語言中的使用，而使用要在語言的情境脈絡中，才能顯現功能。例如：我們在日常的對話中常聽到：「書在桌子上」這種簡單的說明，但若將這句話細說成：「一本封面是白底黑字，書體的長、寬、高各為 28 公分乘以 20 公分乘以 1 公分，名稱是《論語》的平裝書，位置在正面面對書桌的右上角。」這種說明放在日常對話情境中，會讓人覺得莫名其妙；但若是在對命案現場的描述時，或許就符合作為證據的精確要求。因此，語言意義的精確與否，在於是否合於使用脈絡的目的。簡言之，此時的 Wittgenstein 已經從圖像說的精確對應立場，轉而認為符號必須放在語意的脈絡中來理解，需要精確的情境就使用精確的語言，反之亦然。

在此認知上，我們有必要進一步來檢視，屬於能指 (signifier) 系統的符號，是否可以等同於所指 (signified) 概念背後那個真實本身？當我們說「月亮」時，這個月亮的符號 (即：A')，是否就等同於直徑約是地球 1/4，且是地球的衛星的那個星球 (即：真實本身 A)？如果我們認為符號僅是表達一個所指的概念的話，那這個在腦海裡所形成的概念 A'，就絕對無法等同於在真實世界的實體 A，前者存在於觀念世界，後者存在於真

實世界，這兩個世界雖然可以藉由符號的再現發生聯結，卻絕對不是數學定義上的全等 (congruent)，亦即： $A' \neq A$ 。也就是說，不論是圖像說還是遊戲說，都無法擺脫符號作為媒介，而此一作為描述真實的媒介並不同於真實本身。更精確的說，再現不但無法擺脫以符號為媒介的宿命，而屬於觀念界的符號，也無法等同於實在界的現象本身。

嚴格而論，我們對某一現象從經驗感知，到透過文字符號媒介再現的過程，可以發現中間存在幾個層次的轉換：首先，當我們感知到外在世界的時候，就會出現選擇性的注意或不注意，也就是會意向著關注的某事／物，而同時也忽略了次要的某事／物，這是第一次篩選；接著，我們會把這個經過選擇後的經驗，留存在記憶中；當我們認為要將這個記憶，做長時間的保存時，就會試著將記憶中的經驗，透過文字符號系統再現於筆記或電腦中，但這時候我們的腦海中，又會再一次對該經驗進行簡化，以避免冗長、且與我們所要陳述的主題不相關／低相關的敘述，這時我們就進行了第二次的篩選（研判何者需要被敘述或不被敘述）；但是為了能夠找到我們認為「精準」的語言，我們會在眾多相似的語詞中，選擇我們認為最為符合、最能對應真實經驗的文字符號來再現該經驗，因此當我們選擇了某一種敘述方式時，也就等於捨棄了其他可能的敘述方式，這就出現了第三層次的篩選。最後，當我們的敘述文本被閱聽人閱聽到之時，閱聽人也會依照自己對該再現的文字符號意義的體認，擬想自己心中所認知到的「真相」，這種認知的歷程，也涉及到閱聽者個人，對文字含意的篩選（哪些讀起來有感，哪些讀起來無感），也就是第四層次的篩選。當一個現象經過這四個層次的篩選與轉譯，現象界與經驗界之間、文本與真實之間，閱聽人最終所能掌握的「真相」，到底還能夠剩下多少？已經成為持實在論主張的人，無法迴避的核心問題了！

當我們從實在論的立場，確認上述的邏輯理路，即雖然我們相信存在一個外在的真實世界，但我們要描述這個真實世界，卻需要藉由我們認為

具透明性的符號系統，作為再現真實的手段，一旦失去符號的介質，我們的思想就失去了存在的依託；但同時也發現屬於觀念界的符號，經過多重轉換之後，已無法等同於實在界的現象本身。此時，實在論的再現基礎發生鬆動，本研究將接著從以相對論為基調的建構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觀點，回歸到對人的意識層面進行探索。

(三)思 (cogito) 與無思 (unthought)²⁰

當代有關人類意識的研究，已有相當成果，並成為我們現在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其中包括感覺 (sensation)、知覺 (perception)、無意識 (unconscious)、前意識 (preconscious)、潛意識 (subconscious)、意識 (consciousness) 等。人要形成意識，最初是從感覺開始，先透過視、聽、嗅、嚐、觸等五種感官，與世界進行訊息的連結並形成知覺，之後每一階段容或有些微差異，最終經由篩選讓重要的訊息進入意識層面，而相對不重要的訊息，就被保留在其它的層次。例如：一位參加 100 公尺決賽的選手，在進入「各就位」的靜止階段，並接收到「預備」訊息之後，他會將蹬地的雙腿伸展到準備起跑的適當位置，並將身體重心向前移至雙手後，就會將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在對發令槍的聽覺上，而其他四種身體感官功能所感受到的，如地面對手指的反作用力、眼睛所看到地面的塵土與動物、周邊嘈雜的加油聲、陣陣飄來的鹽酥雞香，以及拂面的輕風...等，都會成為被忽略的訊息，而留置在無意識或前意識階段，並沒有進入意識的層次。

當身體五感搜尋到的訊息進入意識中，人開始分辨輕重緩急，才開始產生意識與思想。但 Foucault 卻明確指出，人在「思」之外，還存在「無思」的層面：²¹

²⁰有關「unthought」一詞的中譯，在華人譯本中有譯做「非思」者，但本文傾向譯成「無思」，這也呼應本文將「unconscious」譯為「無意識」的相同翻譯邏輯。

²¹在《事物的秩序》第 9 章〈人與其雙重性 (Man and His Doubles)〉中，Foucault 以一個小節說明了人的思與無思之間，那種糾纏不清，卻又是一體兩面的景況。若有意

對人而言，無思即是他者 (Other)²²：它者不僅是兄弟，而且是雙胞胎，不來自於人，也不在人之中，而是在他身邊，在同一相同的新事物中，也在同一不可避免的二元性中。...這是一種雙重性 (double)，既是他者也是影子 (shadow)：在黑格爾式的現象學裡，它是作為自為 (für sich) 對立面的自在 (An sich)；對叔本華來說，它是無意識 (Unbewusste)；對馬克思而言，他是被異化的人；在胡賽爾的分析中，他是不清晰的、非現實的、被積澱的、無結果的——在任何情況下，取之不盡的雙重性存在於反思中，作為人在他的真理中的模糊投射，但他也扮演著一個初步基礎的角色，人們必須在這個基礎上匯集且喚回自己以獲得他的真理 (Foucault, 1973, p. 326-327)。

Foucault (1973, p. 324) 進一步認為，有別於 Descartes 所指陳的思，現代的「思」必須以明顯的形式貫穿、複製和重新激活思與無思的連結，此一無思在思之中，在思四周，在思之下，雖然它不是思卻與思並不陌生，若根據一種不可簡化、不可跨越的外在意義來判斷的話，這個無思又不是關於思的。此一說明，讓我們驚覺：當主體意識到自身正在思考時，發現背後還存有一個無法被意識到的無思，隱藏在思維的底層，這正是思想無法觸及的部分。當思想處在無法觸及的底層時，自然就無法以符號為媒介，再現於各式各樣的文本中。於是各種承載知識的研究文本，試圖透過符號的再現系統，將研究者思想完整複製的企圖，本質上就具備一定的有限性。

另外，依據黃光國 (1995, 頁 93) 的詮釋，認為以往哲學試圖消解人

進一步理解此一論述者，可自行參閱。

²²Other 一詞，有人譯為「它者」，亦有譯為「他者」，或另有一說：哲學界大師沈清松主張譯為「多元他者」(李明宗, 2022, 頁 172)。本文認為前者太過物化，後者又太過冗繁，故本文以為譯為「他者」為佳。

類有限性的作為，其實是徒勞無功的，人只有通過認識自己的有限性，而不是消除這種有限性，才能夠真正認識自己。在論及 Foucault 有關於「人的知識」時，黃光國 (1995, 頁 96, 頁 98) 更指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存在時，便已經在使用一種來源不明的語言，他既無法用思想語言完全看清自己，也無法清楚描述與控制自己的慾望，更無法清楚說出他所有的歷史與經驗，而這一切卻是他思維與行動的基礎。換言之，任何的「我思」，都必須以「無思」作為基礎；當我們試圖澄清某一部分的「無思」，將其轉變成「我思」中的信念時，每一個信念的意義，又必須以它的「無思」作為背景，才能突顯出來。這是以人的有限性為基礎，所從事的社會科學研究必然會遭遇到的問題。

類似的說法亦見於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對自身「非可知性 (non-knowing)」的闡釋：

這不是一種放入「我不想知道」的形式中的非可知性，...它在某種程度上是結構的非可知性，是異質的 (heterogeneous)，是外在於知識的。這不只是能夠被知曉的、和我放棄知曉常識的那種未知的東西。這是某種知識不可能涉及到的東西。……這完全不是為了算計或使詭計，或設置障礙不讓人接近某種我知道而別人肯定不知道的東西。這是一種對於秘密更古老、更原初的體驗，這不是我在隱藏，或某人必須隱藏或掩飾的一樣東西或一些訊息，他是一種不向訊息敞開的，抵制訊息和知識的、即時性地自我密寫 (self encrypt) 的體驗 (Derrida, 1997, 頁 7)。

簡言之，依據 Foucault 和 Derrida 的觀點，當我們正有意識地思維的同時，卻另有一層無思或非可知性籠罩在我們意識的背後；因此，當我們試圖將意識轉換為符號時，中間就出現了不明不白的裂隙，而此一裂隙使得我們嘗試藉由符號再現思想的企圖，永遠無法精準，也不夠完整；這也

同時證明了再現的不完滿性。

(四)知識與符號

人類知識系統的建立，除了靠口耳相傳之外，主要還是要透過符號的紀錄，形成文本 (text) 傳遞下去。無論是口耳相傳或是符號的文本，都屬於再現的形式。但人類要將經驗整理成知識，需要藉由語言或符號再現，以便讓他人理解，這些符號（當然也包括語言）系統，除了在自然科學中，對某些符號有精準而單一的定義之外，其餘使用的文字多屬於日常語言。這種日常語言具有高度的含混性，例如：蘋果，可以指一種水果，也可以指一種電子產品的品牌；而機車，可以是一種交通工具，也可以是年輕人對某個人或事不滿的形容詞。這使得 Wittgenstein 在前期討論語言的功能與結構時，給語言劃定這條「可說的要說清楚，不可說的就要保持沉默」的界線，就成為語言不可承受之重。

Liotard (1984, p. 27-29) 的提醒或許可以是另一種參考的面向：值得注意的是，科學知識長期以來或顯或隱，都忍不住求助於那些屬於敘事性知識 (narrative knowledge) 的程式；雖然從科學的觀點來看，敘事性知識根本就算不上是知識。但沒有敘事性知識的幫助，科學將處於一種自我假設又自以為是的狀態、陷入自己貶斥自己的境地。因為人們認識到真理的條件是內在於科學遊戲的規則中，且本質上是由科學論辯歷程內 (within the bonds) 建立起來的，並沒有其他證明這些規則比專家們的共識更好。Liotard 的這種論述讓我們驚覺，人們對知識的探究離不開再現的符號，而再現的符號文本，就以敘事的形式展現出來，這包括了量化與質性、實證與非實證、科學與非科學的各類型文本，最終都必須透過敘事的形式再現知識，以完成知識的建構。甚至就連具備單一定義的科學符號系統，在對符號的定義進行陳述時，也不得不使用以敘事性知識為基礎的日常語言。

除了可能存在的「無思」與「非可知性」外，還可以發現：除了能夠被符號化的再現知識之外，還存在一種無法被符號化的知識，即 Michael Polanyi (1891-1976) 所提出的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²³。這是一種無法用語言符號加以表達的知識，它只能意會、無法言傳。正如 Polanyi (1974, p. 95) 所言：我們一切的知識都具有極度的默會性，使得我們永遠無法說出我們所致知的所有東西。Polanyi (1974, p. 87-95) 藉由焦點意識 (focal awareness) 和支援意識 (subsidiary awareness) 來說明，人類在閱讀或聽演講時，對意義的掌握，其實都需要以默會的能力為根基。因此他認為「所有的知識，若不是默會知識，就是植基於默會的知識。」²⁴這表示那些可以說出來、寫出來的東西，不能將其視為知識的全部，重要的是這些明言知識背後的默會基礎；甚至即使像數學這種知識背後的那套推理的東西，都需要我們非言述的 (inarticulate) 心智能力參與其中，才有可能；而抽象等級愈高的數學，愈需要默會的能力 (鄒川雄，2005，頁 37)。

另外，知識的建構與權力 (power) 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具備有能力透過符號再現知識的人，就掌握了想要再現哪些知識，或想要忽略哪些知識的決定權；因此當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說：知識就是力量的時候，Foucault 卻認為「知識就是權力」，因為權力與知識是一體的兩面，互為構成要素，權力內在於知識，而知識便是權力 (但昭偉，無日期)。因為掌握了述說能力的人，就掌握了篩選哪些是重要或不重要的事實，而需要或不需要被述說的決定權。此外，透過符號的再現，又很難避開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例如人類學研究中，最有名的案例即：Malinowski 在研

²³默會知識有時也被稱為「內隱知識 (implicit knowledge)」。

²⁴引號內文的說法，係引用鄒川雄 (2005，頁 37) 的資料。筆者試圖從 Polanyi 的原典中，尋找確切的出處，遺憾的是並未找到原始出處。但從 Polanyi (1974)《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書中，第二單元〈默會成分 (Part two: the tacit component)〉的說明，筆者認為此一對 Polanyi 論點的總結性歸納，應該是正確無誤的。

究 Mailu 與 Trobriand 兩個原始社會時，所寫的田野日記，²⁵打亂了人類學的陣腳。此後，任何過於自信和一致的民族誌聲音，都被暗中打上了問號：它掩飾了甚麼樣的慾望和疑惑？它的「客觀性」是如何從文本中建構起來的 (Clifford, 1986, p. 14)？再現的文本到底再現了誰？是研究者企圖再現的那個他者，還是他者本身？此一案例，帶動人類學對於再現文本中，可能隱含作者自身的意識形態的反思，原本認為符號文本所具備的透明性，則因作者意識形態可能介入而開始出現動搖，於是就引發了質性研究的再現危機。

總括而言，當人們試圖再現某個經驗時，已經無法擺脫以符號為媒介的宿命；而透過概念化的符號作為再現的文本，又與外在真實不同；當人在意識層面思考相對應的符號，以便更符合對經驗的描述時，卻又存在著做為他者的無思或非可知性，使經驗描述的本身，受到一定程度的侷限。確認這三層對再現的認識論解說之後，最後更發現透過符號再現的知識，既有高度含混性與無法言說的部份，又可能充斥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並以掌握知識的權力者之姿出現。於是在溯源「再現」的歷程中，無論從實在論觀點或是從相對論觀點切入，都發現：再現不但無法等同於真實本身（即： $A \neq A$ ），再現背後還存在無法被再現的事物，而再現之後的文本，也因暗藏作者可能的權力與意識形態，而不再被認為具有價值中立的透明性。在這層認識論基礎之上，終於將質性研究推向了再現危機期，並隨之引發「合法性危機」與「實踐危機」。

三、再現危機的出現與後續

從前述認識論的理解中，質性研究者體會到：所有試圖再現世界的研

²⁵請參閱本文註腳 10 的說明。

究文本，都充斥著模糊與不確定性，甚至隱含著個人的意識形態和知識權力間的糾葛，研究不再如想像般客觀中立，所有的再現文本都可以視為作者對其經驗的詮釋。研究者「必須對語言和文本作積極主動的研究，語言和文本與意義 (significations) 和意思 (meanings) 之間的模糊關聯，顯示出它們的局部、語境和隨意性 (arbitrary) 的本質。...而再現是選擇關注或不關注什麼的問題，以及被觀察的對象是如何被提出來的問題 (Alvesson & Sköldbberg, 2000, p. 169)。」於是，質性研究成果的真實性受到質疑：

所有的文本策略都依賴於語言與世界之間，先驗的和關鍵的分離。它使得沒有概念中介的視覺感知過程，成為關於世界的知識之起源，並使語言成為知識得以出現在敘寫 (descriptions) 中的手段。科學有賴於具充分敘寫能力的語言以再現世界，但為了從個體的知覺轉向一致的觀念，也需要具充分溝通能力的語言，這種語言能使科學家在社群之內形成共識；而科學的失敗在於它未能調和再現與溝通之間的競爭，每次強化再現都會威脅溝通，每次達成一致的溝通時，又都標示著再現的失敗 (Tyler, 1986, p. 123)。

類似的觀點也被提出：尤其有趣的是，這裡有一些被引入的新思想，他們關係到語言、意義、主體、理論支撐結構的可能性和可欲性、想像的重要性，以及社會科學研究風格和文本製造中，文學與「事實」之間的關係。簡言之，從傳統來看，雖然語言能夠傳達意義或指示內容，但該思想質疑了語言能力，質疑了學者描述外部實在和指示內容的能力。這意謂著研究者和研究的權威，被從根本上受到質疑，後現代主義把社會研究和研究的議題，從解釋與確認轉移到學者 / 修辭者 (scholars/rhetors) 試圖說服彼此的對話上 (Alvesson & Sköldbberg, 2000, p. 151-152)。這種質疑不但將質性研究帶入再現危機，也同時引發合法性危機與實踐危機，這也就是本

文在首節提到再現危機所引爆的「三大危機」。

原本以為再現是科學研究得以相互溝通、承先啟後的基底。當此一基底動搖時，再現之後知識的合法性開始受到挑戰。也就是說，不論從實證論立場，認為存在一個可被人認知的外在客觀世界，再現的目標就是要再現人對該客觀世界歸納的結果知識；或是相對論立場，試圖透過不同個體經驗感知所彙整的知識，藉由再現的文本展示在讀者面前，都無法確認再現可以等同於被再現的客觀世界（實證論），或等同於存在於個體內在的經驗文本（相對論或詮釋論）。於是，此一再現文本是否能夠代表所要對應的存在對象，即外在客觀世界或個體內在經驗文本，就受到質疑，能指不再足以代表所指，再現文本的權威性於焉消逝，其合法性相對就出現問題了。研究者、被研究者 / 研究參與者，²⁶以及讀者們開始反思，研究文本所再現的，到底是誰的內在經驗？抑或是誰認知的客觀世界？

當再現的文本不再具有代表「實在」的合法性時，隨之而來的將是該再現文本所展示的知識，在實踐階段一方面會讓人懷疑實踐的有效性，一方面擔心實踐過程可能的偏差性，於是連帶引爆所謂的實踐危機。亦即：因為再現涉及研究者對所蒐集之原始資料的取捨、篩選、放大或節略，都可能與研究者自身的政治或道德立場有關；接續而來的問題是：既然文本可能潛藏研究者自身的政治或道德立場有關的意識形態時，對讀者而言，難道不存在多元閱讀的可能性嗎？難道閱讀時不會涉入自身的政治或道德立場嗎？又，面對研究相同「他者」的不同研究，難道不能有不一樣的詮釋結果嗎？如果研究結果有如一言堂般的一致，世界還有改變的可能性嗎？因此，質性研究在再現危機期的學術反省焦點，在於誰在書寫？用什

²⁶在質性研究領域中，一般而言較不願意將研究對象稱為「被研究者」，因為這涉及在研究場域中的權力位階的高低關係，即：研究者屬於權力的支配者，居於較高的位階，而「被研究者」則居於權力較低的位階，屬於被支配者。近年的質性研究，較常用「研究參與者」來取代前者的稱呼，以便呈現其在研究中，與研究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是平等互惠甚而合作的關係。本研究將兩者並呈，主要是希望讓讀者理解所指稱的對象。

麼方式書寫？有誰參與書寫？書寫人的立場為何？書寫人和被書寫人的權力關係為何？書寫的成品給誰看？於是，寫作「即自我反思」成為最大特色（劉一民，2005，頁91）。

經過再現危機期的自我反思寫作階段，質性研究迅速邁入第五期，開始對知識進行全面性檢討。好的研究文本，應該避免根據整體單一邏輯（monolithic logic）而封閉起來；相反地，矛盾、片段、反諷、自我反思和多元視角，必須滲透到整個研究工作中，不僅應包含之前的思考與筆記，還應該包括對最終文本的寫作（Alvesson & Skoldberg, 2000, p. 171）。質性研究對文本立場的解讀，開始從現代性轉向後現代性，不再受制於現代性的「再現」所需承擔「對應真實」的承諾義務與困境，而是以對整體「喚起的（evocative）」²⁷後現代風格取代「再現」。因為喚起而非再現的整體關鍵點，在於它擺脫了模仿，以及不適當的科學修辭模式的束縛；這些修辭模式包含對象、事實、描述、歸納、概括、驗證、實驗等概念（Tyler, 1986, p. 130）。喚起既非展現（presentation）亦非再現，它並不展現客體，也並不再現任何對象，卻是透過不在場（absence）讓人得到那些可以被構想，卻無法被展現的東西；因此，它跨越了真實，也迴避了對表現（performance）的評判。它克服了可感知與可構想之間的割裂、也克服了形式與內容、自身與他者、語言與世界之間的割裂（Tyler, 1986, p. 123）。

此外，喚起還具有另一層面的意義：因為文本的再現並不完整，它必然會被作者篩除某些真實的現象；因此它依賴讀者的補充，它喚起了任何作者都無法注入文本的東西，也就是讀者的常識性理解，沒有哪個作者可以完全控制讀者的反應。同時，這也是對傳統「書寫—閱讀」權力關係的顛覆：原本位居權力上端、主導訊息提供的作者，與居於權力下層、被動接收資訊的讀者之間的權力不對等關係，出現了權力結構的變化，成為彼

²⁷有關對「喚起」的詳細說明，可參閱 Tyler (1986, p. 129-132) 的原文，其中有極為精彩的說明。

此共享、互為補充的權力平等的夥伴關係。因而喚起式的書寫風格，展現為現實主義的一種形式，它不描寫客體，沒有描寫與被描寫之間的斷裂，書寫的模式是模仿的 (mimetic)，但它們的模仿只製造出現實的幻象，就如同科學中虛構的現實；這就是讓語言擔任眼睛的工作時，所需要付出的代價 (Tyler, 1986, p. 137-138)。

依 Richardson (2000, p. 931) 所言，這是一種「以文學技巧重塑過往的經驗，以喚起情感的反應。我將之稱為喚起的再現 (evocative representations)。」因為如果一種話語 (discourse) 可以說成是「喚起的」，就不需要「再現」它所企圖喚起者，雖然這種喚起式的話語，²⁸可能仍然難脫再現所需藉助的符號形式。文本因而不再是一種對象或客體，它成為一種手段，一種超越時間和空間的沉思載具，不僅是超越的，而且是對時間和空間的超越回歸 (Tyler, 1986, p. 129)。它既不尋找產生權力的原因，也不尋找產生原因的權力；它是以「傾聽 (listening to)」的接受能力與「交談 (talking with)」的相互性為基礎的。它從另一部分感覺中樞中獲得隱喻，用對話 (dialogue) 取代擴音器中的獨白 (Tyler, 1986, p. 139-140)。於是，這種喚起式的再現寫作方式，在質性研究中至少可以包括：自傳式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故事書寫 (writing-stories)、民族誌小說 (ethnographic fiction)、詩意再現 (poetic representation)、民族誌戲劇

²⁸有關「喚起式話語」的論文，讀者若有興趣閱讀的話，筆者以為可以閱讀由 Carolyn Ellis 與 Arthur P. Bochner 所撰〈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乙文，內容相當有趣，收錄在 Denzin 與 Lincoln (2000) 主編《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的 733-768 頁。此外，本刊審稿委員認為有關 evocative 的知識論書寫，在質性研究是較為少數的，在社會科學界存在較多的爭議與論辯，期盼本文能納入對 evocative 更為深入的論述。坦白而言，本文在嘗試從知識論切入，陳述質性研究如何從試圖再現「真實」，一路走來，發現「再現」真實之不可得。於是質性研究就不再拘泥於符號系統對真實的反映，而嘗試以「喚起的」形式，帶動質性研究的轉向，筆者甚至以為，此一變化亦有可能成為文學界，帶動後人文主義 (post-humanism) 轉向的動力之一。但對 evocative 的知識論書寫與闡釋，筆者目前並未有深入的掌握，或許待自己資料掌握更為完整充分時，才有信心針對此一議題，從知識論視角做更深入的探索。

(ethnographic drama)，以及混搭體裁研究 (mixed genres) 等五種 (Richardson: 2000, p. 931-934)。²⁹

在「喚起」的呼召下，依照劉一民 (2005，頁 92-93) 的說法：舉凡研究者的發聲位置，研究者與他者的權力關係、語言的使用、寫作的方式、作品的合法性，以及作者個人的道德與政治立場等，都在反省之列。而且出現許多嶄新的做法，例如：承認他者對文本的話語權與必要性，書寫展現了研究者與被研究者 / 研究參與者間的對話、協商與合作關係；又，即使再現的權威性已不如往昔，研究者仍嘗試以不同方法再現他者；甚至研究更走向日常生活，更重視幫弱勢發聲的責任，也不再害怕對道德倫理的關懷，而更勇於顯露研究者自身的價值觀。當所有再現的研究文本，都很難再現實在本身、很難脫離知識與權力的糾葛、難以做到真正的價值中立，³⁰甚至不經意就可能滲入作者的意識形態或價值判斷，因而研究文本很難再有品質優劣的絕對區分。³¹質性研究過往跟隨實證主義腳步的研究典範，於焉被揚棄，並進入對研究的書寫進行新的實驗與探索階段。此後的質性研究認識論，從實在論典範轉向相對論典範，並更有信心地展現自身的研究形式與立場。

雖然質性研究經歷再現危機期 (同時引發三大危機) 的淘洗，已經將對真實世界再現給讀者的企圖，置換成透過對真實世界既無法精準且又可

²⁹ 依據 Denzin 與 Lincoln (2002) 在《質性研究探討讀本 (*The Qualitative Inquiry Reader*)》中的分類認為：質性研究的文類，至少具有下列五種形式：1. 反思性民族誌 (reflexive ethnography)、2. 自傳式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3. 詩詞文本 (poetics)、4. 展演性敘事 (performance narratives)、5. 研究文本評價 (assessing the text)；這種分類方式與 Richardson 的分類稍有不同，特別在此加以說明。

³⁰ 依據 Lincoln 與 Denzin (2000, p. 1052) 的觀點：沒有價值中立這回事 (nothing is value-free)。因為所謂追求「價值中立」的命題本身，就可以視為一種價值的選擇；換言之：價值中立本身就是一種特定的價值。

³¹ 此一命題其實包含了所有類型的研究。無論質性研究或是量化研究，沒有一種研究是無須透過再現的符號系統，而能夠形成研究文本的。換言之，當各類研究文本都不得以符號系統為媒介時，將會同樣需要面對再現危機，以及連帶引發的三大危機；於是以往質性研究受量化研究質疑，缺乏具體數據、缺乏信效度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了；同樣也就很難再對研究品質做出優劣的絕對區分了。

能不完整的再現，並以此種文本再現的形式，試圖對研究者自身、研究的參與者／研究對象，以及閱讀研究文本的閱聽大眾，發揮「喚起」的作用，以期激發改變世界的動能。對研究者自己的喚起，在於提醒研究者自己可能存在歷史、文化、信仰、偏見、意識形態等問題，可能會不自覺地滲進自己的研究中；甚至研究者還具備提供或不提供某些資訊的決定權（即在蒐集到大量的研究資訊或數據時，如何取用或捨棄、如何歸納與整理、以何種形式呈現等，都是由研究者所掌握與決定的），這些研究背後的因素，都可能對研究最終的結果產生影響。因此研究者在撰寫研究文本時，要隨時保持自我警覺，並嘗試以多元開放的觀點，再現對研究主題的關懷，進而為無法掌握話語權的對象發聲。在「喚起」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的部分，則是試圖一方面透過與被研究者／研究參與者的互動過程中，療癒其生命過程中特殊的經歷，並將此經歷所帶來的個人成長分享給其他人，讓其他閱聽人能透過自己的案例而得以成熟、茁壯，並促進彼此的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期望透過研究過程的互動，喚起參與者自身的能動性，進而努力積極增能賦權（empowerment），以超越自身的現況。至於在對讀者的「喚起」層面上，透過研究文本一方面召喚讀者的同理心，以凝聚影響社會改革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因為文本再現的不完整，使讀者能在常識性理解的過程中，對再現的文本創造了自行增補與汰除的空間，並提供讀者不同的價值選擇。這是本研究除了在釐清質性研究認識論發生典範轉移的因素之外，還可提供體育運動相關質性研究的學者、合作者與讀者，另一層反思與喚起的附加意義。

總之，質性研究歷經再現危機以及連鎖發生的三大危機之後，學術社群對所有再現的文本，不再有高下等級之分，量化研究與質性研究都無法擺脫「再現」的糾纏，而「再現」背後又充滿各種可受質疑之處，並引發合法性與實踐性的疑慮。因此，最終所有研究文本的品質，都因為再現背後隱含的各種可能因素，而不得不一律平等沒有高下之分，原來以實證論

為研究典範的立場被打破，社會科學的質性研究不再擔心受實證論所主張的信度、效度的挑戰，更有自信地發展各種具有「喚起」意義的研究文類。經由這層後現代意義的轉換，質性研究擺脫了再現所必須面對的模仿，以及不適當的科學修辭模式的束縛，正式結束再現危機的第四期，邁開大步走向後續眾聲喧嘩的實驗階段。

四、結語

應用質性研究方法所進行的學術研究，在體育與運動研究領域，已較早期學術研究階段有明顯上升的趨勢，除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數量出現明顯增幅之外，甚至連屬於自然科學研究領域的運動心理學，亦出現跨足質性研究的現象。這使得以質性方法進行學術研究的學者，將無可迴避的要面對研究背後的認識論課題；於是，本研究從探討質性研究演進史作為起始點，發現從「再現危機」期之後，質性研究的研究典範發生明顯的轉移現象，但引導變化背後的認識論，卻沒有被清晰的論證，是故本研究嘗試採用 Ricoeur 的詮釋學方法，以距離化與據納二種策略，為質性研究認識論的轉折做出詮釋。

經過本研究第二單元「溯源『再現』」的四個論證過程，確認了幾個認識論基礎：首先，確認各種形式的「再現」，都無法跳脫以符號作為媒介的宿命，以期藉由我們認為具透明性的符號，作為一種再現知識的文本展現於世。其次，確認「再現」不僅無法擺脫以符號為媒介的宿命，而屬於觀念界的符號，也無法等同於實體界的存有本身。再者，確認當我們試圖將意識轉換為符號時，出現「思」與「無思」間的裂隙，此一裂隙使得「再現」的企圖，永遠無法精準且不完整。最後，本研究更確認透過符號再現的知識，具高度含混性，甚至還兼有無法言說的部份，更有甚者還可

能暗藏作者個人的意識形態，並以可掌握知識決定權的姿態出現，經常會根據作者自己的判斷，決定取捨所要再現的資料，符號原本的透明性，也可能因意識形態的滲入而瓦解；於是，所有再現真實世界的企圖不但無法達成，甚或有夾帶意識形態偏見的潛在可能性，終於引發三大危機同時併發。

依據前述認識論基礎，說明了再現危機及連帶引起的三大危機之後，學術社群對所有再現的文本，不再有品質高下的等級之分，無論量化或質性的研究文本，都無法逃脫再現的困境，因而各種研究都一律平等。質性研究的認識論基礎於焉出現典範轉移的現象，原本以實證論為研究典範的觀念被揚棄，社會科學走進相對論的研究典範，文本展現整體性的「喚起」姿態，更有自信地發展各種研究文類，並將質性研究帶入後續眾聲喧嘩的各個時期。

引用文獻

- Derrida, J. (1997)。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達里達訪談錄（何佩群譯）。人民出版社。
- 文軍、蔣逸民（主編）（2010）。*質性研究概論*。北京大學。
- 但昭偉（無日期）。*傅科 (Foucault, Michel)*。國家教育研究院樂詞網。擷取於 2022 年，8 月 20 日。<https://terms.naer.edu.tw/detail/1310988>。
- 李明宗（2022）。*旅途與鄉愁*。康德。
- 胡幼慧（主編）（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巨流。
- 陳錦鴻（1990）。語言哲學大師：維根斯坦。載於沈清松（主編），*時代心靈之鑰：當代哲學思想家*（頁 56-73）。正中書局。
-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心理出版

社。

鄒川雄 (2005)。生活世界與默會知識：詮釋學觀點的質性研究。載於齊力、林本炫 (主編)，*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 (頁 21-55)。南華大學教社所。

齊力、林本炫 (主編) (2005)。 *質性研究方法與資料分析*。南華大學教社所。

劉一民 (2005)。 *運動哲學新論：實踐知識的想像痕跡*。師大書苑。

潘慧玲 (2003)。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 *教育研究資訊*, 11(1), 115-143。

蔡錦昌 (1990)。詮釋學大師：保羅·呂格爾。載於沈清松 (主編)，*時代心靈之鑰：當代哲學思想家* (頁 170-189)。正中書局。

瞿海源、畢恆達、劉長萱、楊國樞 (主編) (2013)。 *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 (一) 總論與量化研究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Alvesson, M. & Sköldberg, K. (2000). *Reflexive Methodology: New Vista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Bennington, G. & Massumi, B. (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Jean-François Lyotard, tran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Childers, J. & Hentzi, G. (1995). *The Columbia Dictionary of Mod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lifford, J. & Marcus, G. E. (Ed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lifford, J. (1986). Introduction: partial truths. In J. Clifford & G.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 1-26).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rabtree, B. F. & Miller, W. L. (Eds) (1999). *Do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0).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2). *The Qualitative Inquiry Reader*. Sage Publications.
-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5). *The SAGE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 Ellis, C. & Bochner, A. P.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733-768). Sage Publications.
- Foucault, M. (1973).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Vintage Books.
- Geertz, C. (1983).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Basic Books.
- Gergen, M. M. & Gergen, K. J. (2000). Qualitative inquiry: tension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 1025-1046). Sage Publications
- Hall, S. (Ed) (1997).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2000). The seventh moment: out of the past.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 1047-1065). Sage Publications.
- Lincoln, Y. S. & Denzin, N. K. (2003). *Turning Point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Tying Knots in a Handkerchief*. ALTAMIRA Press.
- Malinowski, B. (2004).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Routledge.
- Marcus, G. E. & Fisher, M. M. (1986).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olanyi, M. (1974).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chardson, L. (2000). Writing: a method of inquiry. In N. K. Denzin & Y. S.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 923-948). Sage Publications.
- Sheridan, A. (1982). *Michel Foucault: The Will to Truth*.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Tyler, S. A. (1986). Post-modern ethnography: from document of the occult to occult document. In James Clifford & G. E. Marcuse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p. 122-14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ttgenstein, L. J. (1996).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outledge.